

【多元觀點】

## 「從思想史思考東亞」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sup>+</sup>

徐興慶<sup>\*</sup>

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崛起中的日本與韓國研究整合平臺」於6月3日舉辦「思想史から東アジアを語る」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學者來自日本、中國、韓國及國內，皆為學術界知名且資深的學者。本次研討會重點集中於東亞近世之議題探討，從思想、歷史的角度切入，提供一個研究時代樣貌、共時性的研究視野。

上午的專題演講，共有四位講者。第一位講者伊東貴之教授以〈東アジアの「近世」と中國の「近代」—中國と日本、思想と社會の異同を中心に—〉（東亞的「近世」與中國的「近代」——以中國與日本、思想與社會的異同為中心）為題，述及中國的「近世」時代劃分，有許多不同的看法。伊東教授認為中國近世為宋元明清，這是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其中

又以明清交替為一個分歧點，很多研究集中探究此時期對日韓兩國的影響。此外，相對於中國的近世，日本的近世則是江戶德川時期。伊東教授比較中國與日本的「近世」，以及明清交替對於當時朝鮮和日本的影響。

第二位講者劉岳兵教授於〈1872年「瑪也西」號船事件與近代中日關係〉演講中，以當時的時代背景為出發點，考察相關文獻，進一步探討當時日本的真正意圖，提出新的論點。認為日本當初提供協助，一大部分原因是為了臺灣及琉球，欲藉此讓中國承認這兩地為日本的領地，其說法推翻過去這個事件的論述。

第三位講者松田宏一郎教授以〈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についての「近世」・「近代」概念と文脈〉（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近

<sup>+</sup> 本文係2012年6月3日由本院「東亞崛起中的日本與韓國研究整合平臺」主辦「從思想史思考東亞」國際學術研討會之活動紀要。

<sup>\*</sup> 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世」、「近代」之概念與文脈）為題，探討「近世」與「近代」的定義。日本先受到儒學影響，明治之後受到西洋影響，「近世」與「近代」並非以東洋或西洋來區分。

第四位講者金錫根教授發表〈19世紀末東アジアと社會進化論—韓國における受容と機能を中心に—〉（19世紀末東亞世界與社會進化論—以韓國為中心討論受容與機能—），述及東亞如何接受進化論「適者生存，弱肉強食」的觀點。認為韓國了解進化論知識的過程可以由日本、中國、韓國三方面來探討。東亞的進化論超越個人到達民族，甚至國家的層次。更以社會進化論來解釋國際的冷漠，以及合理化之帝國主義。

下午進行了三場專題演講及綜合討論。李鍾元教授發表〈韓國の地域外交と東アジア〉（韓國的地域外交與「東亞」）。他以國際外交的視野，提及中日韓各國皆關心東亞共同體，其中又以韓國最重視。並舉出針對亞洲十個國家實施的調查結果，韓國人排名皆在前面。認為東亞各國在政治、經濟方面，都應超越國家、國民，架起一座友好的橋樑。

辻本雅史教授發表的〈教育における日本近世〉（日本近世的教育）中，將重點置於「近世日本的教育如何被看待」，以及「出版媒體對於教育的影響」兩個論點。指出學術界多以近代的觀點看近世教育，他則認為應該反過來站在江戶時代的立場來看近代。提出江戶時代出版大量書籍，增加教育的普及率。先行研究之所以不重視江戶時代的教育，其實與明治之後的近代教育有很深的影響關係。

徐興慶教授發表〈近代日本知識人の臺灣觀——傳統と近現代の葛藤における徳富蘇峰の視點〉（近代日本知識份子的臺灣觀——徳富蘇峰在傳統與近現代糾葛下的觀點）一文，提到日本因三國干涉，被迫放棄遼東半島，這

事件讓徳富蘇峰從平民主義開始轉變其想法。指出徳富蘇峰認為臺灣對日本而言，在擴展南方版圖時，無論是經濟或是政治方面的發展皆勢在必得，且臺灣物產豐富，可以提供日本糧食等後勤補給。因此徳富蘇峰貫徹其「大日本膨脹論」，主張日本應積極佔領臺灣。

最後綜合討論的焦點都集中於「東亞」及「近世」的概念，因此，首要問題便是「近世」一詞該如何去定義。與會者之一的徐勝教授也認為大家雖以「近世」為共通前提，但各自的定義都不盡相同，可以以此為主題再舉辦一場研討會。此外，「東亞」這一概念，其實是從日本開始，建議各位學者下次可從日本方面著手。此次研討會，各位講者都帶來了精闢的演講內容，針對東亞各國歷史背景及各國間互動，各自提出看法，相互交換意見、深入討論。學術研究跨越國界、彼此對話，使得人文與社會科學對話更加活潑、多元且富有深度。

以下為本次大會所發表論文之摘要：

**伊東貴之 (ITO Takayuki)：**

**〈東アジアの「近世」と中國の「近代」—中國と日本、思想と社會の異同を中心に—〉**

中國的「近世」這個時代劃分上的時期，儘管在日本的歷史學界有諸多說法，普遍來說，依 11 至 18 世紀的王朝而言，相當於縱貫宋、元、明、清這樣一段極長的時期。相對的，日本的「近世」大體上被認定等同於江戶（徳川）時代。且如日本當時的儒學學派的朱子學及陽明學，乃為更久以前成立於宋、明時代的思想。這樣的差異起源為何呢？此外，中日兩國「近世」的本質及其本質上的差異，往往被認為具有著其後續之「近代」的相異傾向。大致上而言，從該時期，不管從歷史層面還是思想與文化層面，可看出日本從過去全盤接受中國的影響到相對邁向自立的過程。總之，其也可說是現今探討的兩國特性開始相互

突顯的時代。本報告以歷史層面各問題為核心，特以思想與文化的觀點詳加考察，同時，為不落於文化本質論類的獨斷說法及國民性論調的陷阱中，也將提及作為背景之兩國政治與社會的特質。此外，在可能的範圍內，將同時代朝鮮半島的情勢納入考量，並加上比較史層面的檢討。具體而言，將視點放在中國的王朝體制與日本的幕藩體制，也就是奠基於科舉之士大夫官僚政治與以士農工商階級為前提之武家政權之間的差異，以及封建制與郡縣制、中國儒教、朱子學及日本武士道、國學，加上君臣、忠孝、家、禮等觀念與型態的差異，以明示該時期兩國歷史與社會層面、思想與文化層面之異同為主要目的。於此前提下，關於與西歐、日本相異之所謂中國性「近代」的特質應該作何理解，將加上近年日本方面的研究動向與發表者自行的考察，提出意見。

**劉岳兵 (LIU Yue-bing) :**

**〈1872 年「瑪也西」號船事件與近代中日關係〉**

1872 年日本在美英各國的敦促與協助之下，積極就秘魯「瑪也西」號船事件展開審判，解救了中國被拐賣的勞工，是近代日本史和中日關係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從法制史（領事裁判權）的角度對該事件的研究已經非常詳細，此事件本身的具體過程，也已經揭示得比較清楚了。該事件對近代中日關係的影響，中國大陸學者近年偶有論及。該事件在中日關係史上的意義，既要看到日本方面有對中國講信修睦的友好的一面，但是又不能只是片面強調日本一方的積極作用，且不論日本方面因此而表現出來的「皇國優越」意識的膨脹，無論如何也不能無視日本方面企圖利用此事件而設計的種種「如意算盤」。許多歷史事件，在人道主義的旗幟下常常隱含著偽善的因素。該事件也不例外。這些友善和偽善的因素，可以通過日本方面處理該事件的最高指導

者副島種臣和直接經手人大江卓的言行得到印證。此事件的處理，不僅為日本贏得了「聲譽」，也為其處理臺灣、琉球問題，贏得了謀劃的時間，並得到了美國的「支援」。

**松田宏一郎 (MATSUDA Koichiro) :**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についての「近世」・「近代」概念と文脈〉**

歷史研究上的時代區分，一直以來都是學界的論爭要點。本稿試從日本政治思想研究者的立場，來看日本的「近世」和「近代」的概念在今日是如何被看待。在這之前必須先確認此種區分是否能有明確的定義。筆者認為現今對這種概念仍存有疑慮，因此要思考今後將能夠採用何種研究方法。有關馬克思主義或是近代論為代表的單線發展的時代區分論的疑問已被完整提出。我們經常在坊間看到在大眾媒體或是一般歷史書中，提到日本「近世」的特殊優越性或「近代化」的成功故事（亦或挫折故事），但那在學界中都不具說服力。但是，在去國民國家史成為前提之下，全球化的動向或是東亞地區史的具體研究成果，仍存在不少疑問。在本次的報告中，將探討在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的「近世」、「近代」的概念。

首先，作為第一條線索，必須提起在國外的日本研究者，特別是在英語圈進行有關近世日本思想方法論論爭的 Yamashita、Bolitho、McMullen、Ooms 等學者。此並非討論近世、近代時代該如何區分的論爭，而是思想史研究方法論的論爭。具體來說，就是將該如何看待 modernity 這問題產生連結。接著是重新審視「近世」、「近代」在全球的歷史動向。在那之中，日本國內發生的事件和東亞地區以及全球動向之間的共鳴或差異，以及藉由 modernity 至 modernities 複數形的觀點，來嘗試說明日本 16 世紀到 19 世紀社會的變動及思想狀況。以 J. Fletcher、M. E. Berry、宮嶋博

史、岸本美緒等的論點為線索，最後採用幾本 2000 年以後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著作，分別考察他們是以何種程度來回應「近世」、「近代」這個議題。舉例來說，以渡邊浩、宮村治雄、前田勉等老一輩研究者最近的著作，以及真壁仁、大久保健晴、菅原光、河野有理等年輕學者的著作來做比較，進而檢討今後思想史研究的未來，並加上筆者自身的著作來自我反省。

**金錫根 (KIM Seog-gun) :**

**〈19 世紀末東アジアと社會進化論—韓國ける受容と機能を中心に—〉**

社會進化論 (Social Darwinism) 在舊韓末，也就是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葉，對社會造成巨大的影響。此論延續開化期，特別是愛國啟蒙時期而成為主要的思想變數。在當時，追求富國強兵與自主獨力的知識人，將社會進化論的善與惡交由現實社會評斷，於是此論也扮演著前進未來的重要角色。社會進化論的思想有些從美國傳來，但大多從日本與中國間接傳入。社會進化論的「機能」與「角色」間的細微差別也出現了不同的解釋。

本演講針對思想的「傳播之受容與變形」進行側面剖析，舊韓末的社會是如何接受社會進化論與其機能的傳播，筆者希望在此做個批判性的檢討。檢討方法首先要找出某個並非原形傳入的思想與思維，從此之中探討受容的過程與其「變形」的經過，特別是在限定的條件與狀況之下，這些「受容」的思想是如何演變為適合此國情的型態。從這些觀點來看，在同為東洋圈的日本與中國、舊韓末之間，社會進化論的受容當然有一定程度的相異。我想以此觀點立足，把焦點放在「是誰？用什麼方式？」將社會進化論帶到舊韓末。接著導入並介紹社會進化論在當時形成什麼樣的角色與機能。

講者在檢討中，從各國間的國際定位來看

經由美國、日本與中國間接傳入的社會進化論，在政治、意識型態中的解釋應該有相當程度的差異。因此舊韓末的社會進化論也會同時擁有這些複合的雙重性格。另外，社會進化論所形成的角色與機能也可能有正反兩面的評價。但是 1910 年日韓合併後，這些複合的解釋也被分化，其意圖也確實走向不同的道路。

**李鍾元 (LEE Jong-Won) :**

**〈韓國の地域外交と東アジア〉**

在韓國，論及「地域」時，混合著三個地理概念，而這三個概念有時會競相呈現。最廣域的架構為「亞太地區」，而亞洲的鄰近地區則以「東亞」與「東北亞」分別代表著不同的含意來使用。這三個地理概念隨著時代及情勢的變化移轉重心，為集結韓國地域外交各種方向性與選擇的概念。二戰後冷戰時期，韓國最先打出的地域構想為「太平洋」，也就是「亞太地區」。相較於其傳統作為「東洋」一員的認識，雖是個極大的轉變，對以「分斷體制」為起點並與亞洲大陸地區共產主義各國對峙的韓國而言，實為建立對美關係、確立其存立根柢之戰略。李承晚總統與臺灣、菲律賓等，共同摸索「太平洋聯盟」構想，而朴正熙政權在美國方面支援下，主導了「亞洲及太平洋理事會」的創設。

進入 1980 年代，中美冷戰實際上的終止、經濟相互依存的實質化，使亞太地區更趨向整合性地域形態。韓國盧泰愚政權積極參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 的創設，同時關注北方大陸地區展開「北方外交」。基於這樣的二度轉變，金大中與盧武鉉政權時期，韓國的地域外交大為傾向「東亞」及「東北亞」。金大中總統在 ASEAN+3 的場合推進「東亞共同體」的構想，盧武鉉總統則將「東北亞」的地域合作作為其政策重心。1990 年代以後，活躍韓國的「東亞」論，概可分為 (1) 經濟

共同體、(2) 地域霸權主義、(3) 東亞文化認同、(4) 多極體系理論四個方向。加上經濟及外交與安全保障架構的理論，可看出其中超越近代民權國家之新政治意識與體制方面的縝密摸索。

**辻本雅史 (TSUJIMOTO Masashi) :**  
**〈教育における日本近世〉**

要如何看待「日本近世的教育 (1600-1867)」，我認為要從「知識傳播媒體」的觀點開始重新審視。教育方面的日本近世，在近代教育的形成期中一直被認為是應該被否定的對象。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人確信日本近代教育是成功的，日本近世教育的「近代性」被「發現」，因此我們不得不說那正說明了「近代的成功」。

我們可以將 17 世紀視為文字普及和商業出版的「媒體革命」時代。知識傳播媒體劇烈的變化帶來了知識和社會狀況的改變。從這點來看近世教育，可以明顯看出它和中世、近代之間的連續性及不可連續性。以兵農分離和「石高制」這種制度為基礎的近世社會，無可避免地產生了「文字社會」。文字的普及促成習字私塾和職業教師的出現，進而形成日本列島上平均的文字文化。商業化帶來的大量出版，造成知識、資訊的商品化，在文化大眾化及民眾間素養的促成帶來貢獻。在那之前只能靠聲音口傳及手抄本流通的物語，也因出版使得多數人得以親近，形成所謂的「古典化」。經由學習古典，逐漸在民眾間建立起基本素養觀念。加上習字本的大量流通，大大地普及了民間教育。學習儒學時不可缺少的漢籍教材和日本複刻本的大量流通，也使得學問普及的可能性大增。幕府與各藩領主從事自行出版業（官版、藩版），也推動了武士官僚教育的普及。

近代社會和教育、思想，以文字和出版業

為基礎。因此我們不得不說，日本近代的教育和思想，正是以文字和出版業為知識的傳播媒體。

**徐興慶 (SHYU Shing-Ching)**  
**〈近代日本知識人の臺灣觀—傳統と近現代  
 葛藤における徳富蘇峰の視點—〉**

本報告以思想交流史為視野，以人物交流為主軸，主要探討有「日本梁啟超」之稱的徳富蘇峰 (1863-1957) 對近代臺灣的思維及其思想主張。

在近代東亞國際秩序變遷之下，徳富蘇峰於 1906 (明治三十九) 年首次前往中國，並出版《七十八日遊記》(東京：民友社)，另於 1918 (大正七) 年，在第二次中國旅行結束時出版《支那漫遊記》(東京：民友社)，1929 (昭和四) 年時出版《臺灣遊記》(東京：民友社)。上述文獻中都詳細紀錄了他對近代中國與臺灣的看法。

透過對照中日雙方的徳富蘇峰相關史料，探究在傳統與近現代糾葛之時代潮流中，徳富蘇峰對異國文化的接受及臺灣思維的變遷問題。

1894 年，徳富蘇峰在《國民之友》、《國民新聞》中發表的〈大日本膨脹論〉中提到，「其為臺灣土地、南太平洋之門戶」、「吾等於國防上、殖民上、通路上，深信臺灣不可不取」，顯示臺灣在中日甲午戰爭時對日本的重要性。爾後，他持續關注近代日本該如何看待臺灣，在其《臺灣遊記》中，清楚可見「豐臣秀吉與臺灣」、「徳川家康與臺灣」、「日本人進軍海外」、「培理來日與臺灣」、「日本與臺灣的交流」、「臺灣回歸日本領土」、「支那統治中的臺灣」等論述。

在日本近代化的過程中，徳富蘇峰在「臺灣領有論」系統下的思維及行動究竟為何？在

「脱亞」、「興亞」意見糾葛的時代中，其對亞洲的思維（特別是臺灣觀）又是如何？透過本報告，對照、比較筆者研究的東亞人物、思想交流實例，進而深化、補足「近代中日思想交流」中「自他認識」的研究史。